



卓越学术文库

初唐诏敕文研究

CHUTANG ZHAOCHIWEN YANJIU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

张超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卓越学术文库 ■

初唐诏敕文研究

CHUTANG ZHAOCHIWEN YANJIU

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

张超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郑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初唐诏敕文研究/张超著.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17.7
(卓越学术文库)

ISBN 978-7-5645-3480-6

I. ①初… II. ①张… III. ①诏令-研究-中国-唐代
IV. ①K242.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24954 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 40 号

出版人:张功员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南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710 mm×1 010 mm 1/16

印张:27

字数:513 千字

版次:2017 年 7 月第 1 版

邮政编码:450052

发行电话:0371-66966070

印次: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45-3480-6

定价:5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调换

自序



笔者于2005年前后在郑州大学读硕士研究生期间,就对唐代诏敕的研究产生了兴趣,当时学界的相关科研成果寥寥无几,所以当本人的硕士论文《唐代诏敕研究》在2007年成文时,虽然囿于学力不逮而显得粗糙浅陋,但尚属这方面较早并且较系统的专题论文。2009年秋季,笔者到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师从邓小军教授读博士,又选择唐代诏敕作为博士学位论文课题,更将研究引向深入,又因唐代诏敕涉及自身文体、文学特征的发展,以及唐代社会的方方面面,为避免庞杂过大,统摄不周,遂截取“初唐”一段,全面铺开,综合贯通,成有一系统的论著。现在面世的《初唐诏敕文研究》是在笔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完成的,是关于初唐诏敕文在文献整理、史料价值、人文特质、文学特色、文体发展、文化教育等方面的价值探讨,属于本人的研究计划“唐代诏敕与文学”的一部分,其有关盛唐、中唐、晚唐诏敕的研究,则将留待来日。

笔者有关唐代诏敕的研究,与阅读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翰林学士传论》《唐代科举与文学》等论著有关,两部论著对本人的影响各有侧重点。其中《唐代翰林学士传论》一书对盛唐之后的草诏大手笔们做了专门的撰述,使作者对这一人群的生平及作品有所了解,并产生了研究的兴趣;《唐代科举与文学》是1986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傅璇琮先生的著作,出版以后,反应尚可,得到学界的首肯。这部书对作者最大的启发,是打破了传统的文学研究的范畴,将实用文体与文学沟通起来。在此基础上,笔者拟定了“唐代诏敕与文学”的研究计划,但限于读博期间有限的时间及科研条件,只能将初唐时段的诏敕文拿出来做细致的考索,其他的则留待后续。科学研究是不断深化、不断发展的认识过程,后来者居上是学术研究自身发展的正常现象。笔者自知难以超越前人,但照着前辈的法子自己试图蹚一条新路还是勇气可嘉的,毕竟学术道路是要靠众人的努力才能不断往前延伸的。

2013年5月,笔者通过了首都师范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的论文答辩,顺利毕业,从北京回到了郑州,并获得了河南工业大学的教职。在教学之余,笔

者不敢有丝毫懈怠,一有时间就对论文进行补充、修订。功夫不负有心人,正是沿着这个思路,作者以选题“文学视角下的唐代诏敕研究”成功获得了201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项目编号:15CZW022)的立项资助,《初唐诏敕文研究》也获得了2016年度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著作资助项目的立项,由河南省教育厅全额资助,在郑州大学出版社刊印出版。

这里对本书的写作意旨及主要内容进行一下简要介绍。初唐诏敕文是初唐时期代拟王言的国家最高政令文体。初唐指唐高祖武德元年(618年)至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这一历史阶段。笔者撰写本书的目的在于考察初唐诏敕文在文献学、历史学、文学、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独特价值。

在本书的第一章,笔者对初唐诏敕现有的文献情况进行了述论,并对文本予以校勘。一方面主要从文献整理的角度出发,根据日本学者池田温的《唐代诏敕目录》,结合各种总集、类书,如《全唐文》《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旧唐书》《册府元龟》等,以及相关史籍,如《资治通鉴》《新唐书》《唐会要》等,对初唐诏敕的主要撰写者、唐代各级政治机构及个人对诏敕的留存、唐代诏敕的集本与著录、著录诏敕及讨论诏敕文体特征的历代文献、有关唐代诏敕典制掌故及政治逸闻的文献等情况分别进行述论。另一方面则以《全唐文》为底本,分别对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高宗武皇后、唐中宗李显、唐睿宗李旦(初唐六帝)八段执政时期的诏敕进行文本校勘,包括编年考订及残缺讹夺、重出误收等方面的勘正,以求厘正初唐诏敕文在流传过程中产生的讹误。

本书第二章是对初唐诏敕的史料价值及人文特质的探析。在本章第一部分,笔者主要从文史结合的角度考察初唐诏敕文的史料价值。初唐诏敕文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如官制、举荐、按察、制举、贡举、田农、赋敛、财利、刑法、恩宥、礼乐等,史料价值很高。通过考察初唐诏敕文的措辞及其反映的历史事件、产生的社会影响等,对唐代开国过程中的一系列历史问题进行分析,如李渊兴兵反隋及隋恭帝被迫禅位、李世民弑兄夺权及李渊被迫让位、武德政治于贞观之治有奠基之功等。在本章的第二部分,笔者对初唐诏敕的人文特质进行了分析,论述了唐代开国诏敕旨在安抚民心、稳定政局的德政举措,并将唐代开国诏敕与中国历史上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第一个王朝——秦朝,与最后一个王朝——清朝的开国诏书进行比较,从“稳定社会秩序的手段”“对待儒家经典与知识分子的态度”“律法方面务从宽宥”“与民休息、提倡节俭”等方面,突出初唐诏敕浓厚的仁爱情怀。这种“仁爱”情怀正是初唐诏敕所具有的鲜明的人文特质。

说到以上两章内容,这里要提及陈寅恪先生《金明馆丛稿二编》中收录的两篇他为陈垣的著作写的序:《〈明季滇黔佛教考〉序》及《〈元西域人华化

考》序》。他在《〈明季滇黔佛教考〉序》中从正面对治学提出要求,要把扎实的功力与精深的识见结合起来,即“搜罗之勤,闻见之博”与“识断之精,体制之善”的结合。在《〈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陈寅恪先生则对当时的不良学风予以讽刺:“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则远不逮宋人……史学之材料大都完整而较备具”,因而不可能“人执一说”,自由发挥也要“有所限制”。经学则不然,“其材料往往残阙而又寡少,其解释尤不确定”,这就使“夸诞之人”能够“转可利用一二细微疑似之单证,以附会其广泛难证之结论”,导致“其论既出之后,固不能犁然有当于人心,而人亦不易标举反证以相诘难”,于是“奇诡悠谬”,“不可究诘”。这也就出现一种“速效”:“声誉既宜致,而利禄亦随之”;“于是一世才智之士,能为考据之学者,群舍史学而趋于经学之一途”。陈寅恪先生在当时是有感而发,联系现在学界的不良学风倒也是契合的。

令人欣慰的是,近年来许多学者都在一心一意地做踏实有用之事,与“夸诞之人”走的完全是两条路,笔者也在竭尽全力,践行此途。这正是这篇序文中大段引述陈寅恪先生议论的原因。陈寅恪先生认为,陈垣做学问“搜罗之勤,闻见之博”“识断之精,体制之善”,能给学界“示以准绳,匡其趋向”,能够“关系吾国学术风气之转移”。序文正是想从这种学术风气的角度来对本书进行评论。

此序言不拟对本书做全面、具体的介绍,读者读后,或许会更有所得。这里需要提出的是,笔者选择这一课题是与当前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发展趋势相切合的。

近十几年来,中国古代文体学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国内包括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在内的许多高校的学者们都致力于古代文体学方面的研究,如北京大学的褚斌杰,中山大学的吴承学等。与此同时,文体研究也成为许多大型国际学术交流会议的重要议题。2002年4月,中国人民大学举行了中国古代文体研究学术会议;同年6月,北京大学成立中国古代文体研究中心并召开学术研讨会。两次会议都有许多学者参加,就文体研究的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讨论,也达成了一些共识。比如在北大的会议上,代表们一方面充分肯定了迄今为止的文体学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客观地指出,长期以来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中,确实存在着对文体学的研究不够重视、文体学意识比较淡薄的问题,尤其是与古人相比,这方面显得更为突出,它确实制约了古代文学研究的深化。

可以说,文体学已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界一个比较热门的学术开拓领域。这一研究热潮的兴起,是一种相对于过去更加科学完整的大文学观念指引下的文学研究现象,学术界开始关注一些过去不甚重视的实用性文体。

在这种形势之下,笔者将唐代诏敕作为自己的选题,在硕士生阶段、博士生阶段、工作之后的十年间坚持不懈、努力钻研、积极探求,希望能以自己的科研实践让大家看到,唐代诏敕本身所具有的文献、历史、文学、文化等价值,以及其在文体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等是不应被忽视的。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兴起了对古代文体的研究,传统意义上所谓的官方文书一般也是不大受学者关注的。本书作者所研究的唐代诏敕文,是由唐代的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撰写的制诏,与当时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文化氛围、文学发展规律、文人命运及性格等都有很大关系。中唐时期的白居易和元稹等知名文人在文坛上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他们同样也是当时草拟国家诏敕的大手笔,他们撰写的诏敕文对古文运动起到了相当大的促进作用。然而,因为诏敕文是一种近乎国家政治纲领的官方文告,因此并没有被现代的研究者列入文学的概念范畴,这与当时的文学状况显然是不相符的。传统意义上通行的狭隘“文学”概念,不论内涵和外延,多与中国古代的“文学”概念相去甚远,也与当今学界重视古代文体研究的学术潮流相悖,会束缚我们对中国古代文学范围的探索。因此,本书虽然主要是对唐代诏敕的研究,但由此却能扩展对古代文体研究的领域,拓展人们的视野。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陶文鹏老师,曾经给笔者提出建议:“对唐代诏敕考察的重点应当放在文学研究上”,并条分缕析,详细指出应当从哪些方面下功夫钻研。读者们虽然没有亲耳聆听到陶先生当时给笔者的建议,但是相信看到本书,会认为这个路数是对的。

本书的第三章、第四章正是对初唐诏敕文学价值的研究,也是笔者全书研究的重点。

第三章主要是对初唐诏敕文学艺术特色的探析。一是初唐诏敕呈现出骈文散化的发展趋势。受到唐朝开国之初百废待兴、昂扬开阔的时代风气的影响,初唐诏敕大多质实平易,内容广泛充实,情感真切自然;句式流畅自如、运散入骈、不拘音律;在反对六朝骈文绮靡浮艳文风的同时,亦不失典雅庄重。二是语言风格具有雅俗兼用、形象性、抒情性的特征,显然远胜于六朝诏书的过分雕琢、了无生气。三是初唐诏敕中的骈文特征仍时有彰显,如恰当自如的用典技巧(包括明典、暗典等方式);工整的对偶句式(如单句对与偶句对、正对与反对、成分对与句子对等);和谐的声律与雅致的辞藻等。四是初唐诏敕中灵活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如形象的比喻手法(包括明喻、暗喻、借喻);生动的比拟手法(包括拟人、拟物);合理的夸张手法(扩大夸张、缩小夸张);增强气势的排比手法;设问及反问的句式手法;以此代彼的借代手法;突出事物差别的对比手法;参互成文的互文手法;移人情及事物的移情手法。五是初唐诏敕文中叙事、议论、抒情兼用的表达方式,各尽其

妙,从而增强了诏敕文的艺术感染力,对于其政治功效的发挥也是十分有利的。

第四章是对初唐诏敕在制诏文风发展中所起作用的考察。一是对先唐诏敕制诏文风的总体概述。二是论述了初唐诏敕对前代制诏文风的继承与新变,涉及初唐诏敕对人文情感上颇为相似的汉初制诏在文章形式体制上的沿袭与变通(如文体分类、艺术形式、草诏者身份及制诏文的个性色彩);另外还涉及初唐诏敕对六朝诏诰文风的继承与新变,六朝诏诰体现了由雄健清俊的散体文风到彩丽竞繁的骈体文风的流变;初唐诏敕则是由绮丽华靡的骈体文风到兼具骈文之华赡与散文之疏宕的文风流变。三是分析了初唐诏敕对盛、中、晚唐诏敕及后世制诏文风的影响,涉及在初唐诏敕文风的影响之下,盛唐诏敕气益雄浑的文风变化、中唐诏敕复古尚朴的文体改良、晚唐诏敕骈文复兴时的创作探索;另外还涉及在初唐诏敕的影响之下,唐代后世制诏文对初唐诏敕文体形式上的延续与变通,以及语言风格上的继承与变异。

本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是笔者下功夫最大、写作篇幅最长的两部分,体现出了文学分析的一些特色,如结构精巧、逻辑严密、语言华美、例证丰富、正反类比、用词恰当等。

需要指出的是,笔者并没有停留在文学分析的层次。

在本书的第五章,笔者由初唐文诏敕语言表述方式入手,通过当时的百姓对诏敕文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来判断他们的文化水平及受教育程度,进而对当时国家教育的发展水平予以考察。初唐诏敕文中君主罪己、慰劳百姓、存问部卒、招抚降将的篇章,接受者大多为平民百姓以及武夫悍卒,诏敕文必须质实平易、以情动人,才能更好地起到政治效果。而唐代特重“王言”,初唐“大手笔”们草拟的诏敕风格质朴平实中颇具华彩,那些讲究藻饰的诏敕文雅庄重更不待言。初唐时期的普通民众能够理解这些诏敕文,表明他们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文化水平。文化水平的高低与受教育的程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初唐由中央官学、地方官学、私学构成的国家教育体系已经形成并逐步完善,教育普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泛,民众在这样的文教氛围中受教育的程度也普遍较高。可以说,初唐时期的教育发展水平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朝代。

综上,本书是通过论述初唐诏敕现有文献情况及对文本的勘误、史料价值、人文特质、文学特色、在文体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对初唐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反映,肯定它对于研究中古时期文献学、历史学、文学、文学教育等问题的重要学术价值。

本书在选题方面有一定的难度,书中引用的材料也比较多。本书并没

有追求目前所谓的“时尚”风气。书中引用的材料,除了基础的文献底本如《唐大诏令集》《唐大诏令集补编》,以及常用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之外,还有如《全唐文》《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有数百卷规模的大部头总集、类书,另外作者还打破国籍的界限,引用了一些必需的海外文献,如日本的学者池田温的《唐代诏敕目录》、中村裕一的《唐代制敕研究》等。我们要真正做学问,还是要有自己的标准。引证翔实,正是使人信得过,使自己的学问站得住的好方法。

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的人,出于专业的偏好,可能会对本书的第一部分比较感兴趣,这部分是笔者对初唐诏敕文献留存情况的述论及文本的校勘。本书是以《全唐文》为文献底本的。《全唐文》虽然是清代官修的一部唐五代的文章总集,但由于其编纂乃杂出众人之手,另外还历经了漫长的辗转传抄过程,因而其收录的唐代诏敕文产生了残缺讹脱的现象,失去了其本来的面貌。笔者所做的工作,一方面以《全唐文》为底本,根据日本学者池田温的《唐代诏敕目录》,以及《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总集、类书,同时结合《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等相关史籍,对初唐诏敕文献的基本情况予以考察,如初唐诏敕的主要撰写者、唐代各级政治机构及个人对诏敕的留存、唐代诏敕的集本与著录、著录诏敕及讨论诏敕文体特征的历代文献、有关唐代诏敕典制掌故及政治逸闻的文献等;另一方面则分别对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高宗武皇后、唐中宗李显、唐睿宗李旦(即初唐六帝)八段执政时期的诏敕文进行校勘,主要包括编年考订、残缺讹夺、重出误收等方面的勘正工作。

例如在编年考订方面,本书列有《全唐文》卷一中的《秦王益州道行台制》,《唐大诏令集》将此文定时为“武德三年四月”,虽然已有确凿的年月,但仅为孤证。又检《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之记载:“(武德)三年二月……诏就军加拜益州道行台尚书令。”两书定时相去甚远,因而需要继续考订。《新唐书》卷二《太宗本纪》记载:“(武德)三年四月……高祖遣萧瑀即军中拜太宗益州道行台尚书令。”可见《新唐书》之定时与《唐大诏令集》相同。再检,《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八载:“(武德三年)夏,四月,甲寅,加秦王世民益州道行台尚书令。”因《新唐书》毕竟是于《旧唐书》的基础之上重修的唐史,对《旧唐书》原有的记载之讹误进行过订正,且其定时与《资治通鉴》《唐大诏令集》的记载保持了一致,因此本文当作于武德三年(620年)四月。

又如考订重出误收的诏敕文。本书列出《全唐文》卷十八《命皇太子监国制》一文,被收录于唐睿宗名下,唐睿宗被当作草诏的作者。通过考证可知,本文又被录于《唐大诏令集》卷三十之中,题名为《睿宗命皇太子监国制》,署名为张说,据此可知此诏文并非唐睿宗之作,应归入张说文。

再如勘正残缺讹脱的诏敕文。本书列出《全唐文》卷一《颁示孙伏伽谏书诏》一文,《旧唐书》卷七十五亦录此诏全文,但与《全唐文》不同,《旧唐书》卷七十五所录文中有“仍颁示远近,知朕意焉。兼赐帛三百匹”,然《全唐文》中此句为“仍颁示远近,知朕意焉”,缺“兼赐帛三百匹”六字。另外,《全唐文》卷二收录《修魏周隋梁齐陈史诏》一文,此文又见于《旧唐书》卷七十三《令狐德棻传》、《唐会要》卷六十三《修前史》、《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国史部·选任》、《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六《国史部·采撰》之中。然而《全唐文》卷二收录本文中有“务加详核,博采旧闻,义在不刊,书法无隐”一句,但在《旧唐书》卷七十三、《唐会要》卷六十三、《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四、《册府元龟》卷五百五十六等文献的记载中却不见此句,因此《全唐文》当为衍出 16 个字。此外还有《全唐文》卷一《秦王太尉陕东行台制》(P18 下)一文中“可太尉使持节陕东行台”,本文又见载于《唐大诏令集》卷三十五《诸王·除亲王官上》,然文中此句为“可大尉使持节陕东行台”,句中的“大”当为“太”,乃形近误写。

做古代的学问,材料征引,文献考证,其难度是很大的,有时看起来似乎没有底,即使是大师级的学问家也难免有所疏忽。钱锺书先生的《管锥编》于 20 世纪 80 年代在中华书局出版后,就陆续有一些读者写信,通过出版社辗转传达给钱先生,指出他文字引用中的疏误,《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上曾有所刊登,钱先生对此是十分感激的。本书作者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青年研究者,首次著书立说,虽然态度谨慎小心,然而囿于学力,自知谬误必多,在此唯祈博通君子不吝指教。正如二三知己,促膝而谈,既“奇文共欣赏”,又“疑义相与析”,这当会有一种辩学术、论世情的理趣,对于学术发展及作者个人成长都是有利的。

是为自序,谨就教于学界同人。

2016 年 3 月于郑州

目录

绪论	1
一、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1
二、学术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4
第一章 初唐诏敕文献情况论述及文本校勘	11
第一节 初唐诏敕文献基本情况论述	12
一、初唐诏敕的主要撰写者	14
二、唐代各级政治机构及个人对诏敕的留存	32
三、唐代诏敕的集本与著录	34
四、著录诏敕及讨论诏敕文体特征的历代文献	39
五、有关唐代诏敕典制掌故及政治逸闻的文献	41
第二节 《全唐文》初唐诏敕编年考订及讹误勘正	42
一、唐高祖李渊诏敕编年考订及讹误勘正	43
二、唐太宗李世民诏敕编年考订及讹误勘正	62
三、唐高宗李治诏敕编年考订及讹误勘正	82
四、高宗武皇后诏敕编年考订及讹误勘正	98
五、唐中宗李显诏敕编年考订及讹误勘正	106
六、唐睿宗李旦诏敕编年考订及讹误勘正	117
七、初唐诏敕文校勘小记	133
第二章 初唐诏敕的史料价值及人文特质探析	136
第一节 初唐诏敕的史料价值	137
一、隋义宁二年五月诏与唐武德元年六月诏：李渊兴兵反隋及 隋恭帝被迫禅位	138

二、唐武德九年六月至九月诏书:李世民弑兄夺权及李渊被迫让位	148
三、唐武德元年至九年诏书:武德政治于贞观之治有奠基之功	158
第二节 初唐诏敕的人文特质	167
一、稳定社会秩序的手段:德厚仁爱,与民休息	169
二、对待儒家经典与知识分子的态度:崇儒兴学,发展教育 ...	180
三、律法方面:务从宽宥,多行恩赦	189
四、轻徭薄赋,发展生产;提倡节俭,杜绝贪腐	197
第三章 初唐诏敕的文学特色分析	209
第一节 骈文散化的发展趋势	213
一、内容充实,情感真切	215
二、骈散交错,不拘音律,句式流畅	220
三、反对绮靡浮艳,倡导庄重典丽	222
第二节 生动感性的语言风格	225
一、语言的雅俗兼用	225
二、语言的形象性	227
三、语言的抒情性	228
第三节 时有彰显的骈文特征	229
一、恰当自如的用典技巧	230
二、工整的对偶句式	239
三、和谐的声律与雅致的辞藻	241
第四节 多种修辞手法的灵活运用	245
一、形象的比喻手法	246
二、生动的比拟手法	250
三、合理的夸张手法	253
四、增强气势的排比手法	256
五、设问、反问的句式手法	258
六、以此代彼的借代手法	261
七、突出事物差别的对比手法	263
八、参乎成文的互文手法	264
九、移人情及事物的移情手法	265
第五节 叙事、议论、抒情兼用的表达方式	268
一、叙事方式	268
二、议论方式	270

三、抒情方式	271
第四章 初唐诏敕在制诏文风发展中的作用	274
第一节 先唐诏敕制诰文风概述	274
第二节 初唐诏敕对前代制诏文风的继承与新变	278
一、“诏令之美,无过汉唐”:初唐诏敕对汉初制诏文风的继承与新变	278
二、从“绮靡浮艳”到“富赡”“疏宕”:初唐诏敕对六朝诏诰文风的继承与新变	293
第三节 初唐诏敕对盛、中、晚唐诏敕及后世制诏文风的影响	308
一、骈文传统的扬弃:初唐诏敕对盛、中、晚唐诏敕文风的影响	308
二、文体特色的传承:初唐诏敕对唐代后世制诏文风的影响	338
第五章 由初唐诏敕看初唐的国家教育	347
第一节 由初唐诏敕的语言表述方式考察唐人的文化水平	347
一、引子	348
二、初唐诏敕的语言表述之功及唐人理解能力之效	349
第二节 初唐国家教育发展状况考察	364
一、初唐教育繁荣的背景	365
二、初唐时期的官学	372
三、初唐时期的私学	377
四、小结	380
结语	382
附录 初唐诏敕与历史大事系年(618—712 年)	391
参考文献	409
后记	413

绪 论

一、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初唐诏敕是初唐时期的六位皇帝分别于八段执政时期颁布的治国诏诰,是当时具有最高政治权威的下行政治公文。

“初唐”指唐代开国到唐玄宗先天元年(618—712年)这一历史阶段,共包括六位皇帝的八段执政时期,即唐高祖李渊(618—626年)、唐太宗李世民(627—649年)、唐高宗李治(650—683年)、唐中宗李显(684年1月23日—684年2月27日)、唐睿宗李旦(684—690年)、高宗武皇后(690—705年)、唐中宗李显(705—710年)、唐睿宗李旦(710—712年)。唐玄宗开元元年(713年),唐朝进入盛唐阶段,初唐历史阶段结束。

本文主要从文献整理、史料价值、人文特质、文学特色、文体发展、文化教育等方面来考察初唐诏敕文的独特价值。

(一)从文献整理方面来看,唐代诏令在《新唐书》中大抵未被收录,《旧唐书》《通典》《唐会要》《册府元龟》等书中所收录的唐代诏敕文本多存在遗漏或讹误的现象

唐代《实录》除唐顺宗一朝外,其余早已散佚。《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五《史部·诏令奏议类》称《唐大诏令集》为唐代“诏诰命令之得以考见者,实籍有是书”。但实际上清乾隆年间编修《四库全书》时,《唐大诏令集》便已阙失了第十四卷至第二十四卷、第八十七卷至第九十八卷共二十三卷的篇幅。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五十五《史部·诏令奏议类》所云:“参校诸书皆同,其脱佚盖已久矣。”因而根据日本学者池田温的《唐代诏敕目录》,并结合各种总集、类书,如《全唐文》《唐大诏令集》《文苑英华》《册府元龟》等,以及相关史籍,如《资治通鉴》《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等,可以对初唐诏敕的现有文献情况有一个大致了解,如主要撰写者、唐代各级政治机构及



个人对诏敕的留存、唐代诏敕的集本与著录、著录诏敕及讨论诏敕文体特征的历代文献、有关唐代诏敕典制掌故及政治逸闻的文献等。由于初唐诏敕文在流传过程中,文本产生很多讹误,因而以《全唐文》为底本,分别对唐高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高宗武皇后、唐中宗李显、唐睿宗李旦执政时期的诏敕文进行编年考订及文本的残缺讹夺、重出误收的勘正,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可以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良好的文献基础。

(二) 初唐诏敕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及人文特质值得人们关注

从史料价值来看,初唐诏敕涉及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律法、外交、教育、文化等多方面的史实,可补正史之阙。对初唐诏敕文的措辞表述、反映的历史事件、产生的社会影响等进行考察,可以帮助我们对唐代开国时期的几个历史问题进行再认识。如李渊的兴兵反隋及隋恭帝被迫禅位、李世民的弑兄夺权及李渊被迫让位、武德政治于贞观之治有奠基之功等,这是对初唐诏敕史料价值的考察。

从人文特质来看,唐代开国诏敕作为唐代开国时期一系列旨在安抚民心、稳定政局的德政措施的文字载体,在人文情感上具有浓厚的仁爱情怀,而这一特征在与秦代、清代的开国诏书进行比较时进一步得到了凸显,如三个朝代开国诏书的内容中“稳定社会秩序的手段不同”、“对待儒家经典与知识分子的态度不同”、律法方面存在“严刑峻法与务从宽宥的不同”、社会经济方面有着“残酷盘剥、奢侈浪费及与民休息、提倡节俭的不同”。这一研究是对初唐诏敕文思想内容及人文情感的分析。

(三) 从文学艺术特色的角度看,孔子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刘勰《文心雕龙·诏策》要求诏策文的文辞应当庄严华伟,雍容典雅,这些理论影响着人们对诏敕制诰文的审美要求

初唐诏敕的文风颇具特色。一是“骈文散化”。受到唐朝开国之初百废待兴、昂扬开阔的时代风气的影响,初唐诏敕在反对六朝骈文绮靡浮艳文风的同时,亦不失典雅庄重,文风大多质实平易,内容广泛充实,情感真切自然,句式流畅自如、运散入骈、不拘音律。二是语言方面“雅俗兼用”,具有“形象性、抒情性”的特征,显然远胜于六朝诏书的过分雕琢、了无生气。三是受六朝骈文余绪的影响,“骈文特征仍时有彰显”,如在用典方面,使用典故的数量及频率较之六朝大为减少,常用熟典,自然贴切,如从己出;在句式方面常用到对偶,如单句对与偶句对、正对与反对、成分对与句子对等;另外还具有和谐的声律与雅致的辞藻等。四是初唐诏敕文中灵活运用了多种修辞手法,如比喻(明喻、暗喻、借喻)、比拟(拟人、拟物)、夸张(扩大夸张、缩小夸张)、排比、设问、反问、借代、对比、互文、移情等。五是初唐诏敕文中叙事、议论、抒情兼用的表达方式,各尽其妙,从而增强了诏敕文的艺术感染



力,对于其政治功效的发挥也是十分有利的。

(四) 初唐诏敕在制诏文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一个方面体现为初唐诏敕对前代制诏文风的继承与新变。例如,初唐诏敕对汉初制诏在人文情感上有所继承,而在文章的形式体制上则既有沿袭也有变通,如文体分类、艺术形式、草诏者身份及制诏文个性色彩的变化。又如,初唐诏敕对六朝诏诰的文风既有继承也有变化。因为唐代诏敕的撰写往往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草诏者对字词选用、结构摆布、详略安置等都颇为讲究,初唐诏敕文对声韵、辞藻、用典、对仗等骈文艺术特征的时有彰显,正是对六朝骈体诏诰文风的继承。同时,初唐诏敕又受到了唐朝开国之初百废待兴、昂扬开阔新气象的影响,在艺术形式上较之六朝诏诰也有所变化,呈现出由绮丽华靡的骈体文风到兼具骈文之华赡与散文之疏宕的文风的流变,与六朝诏书的骈体文风已有明显不同。第二个方面体现为初唐诏敕对盛、中、晚唐诏敕及后世制诏文风的影响。例如,在初唐诏敕文风的影响之下,盛唐诏敕气益雄浑的文风变化、中唐诏敕复古尚朴的文体改良、晚唐诏敕骈文复兴时的创作探索等。又如,在初唐诏敕的影响下,唐代后世制诏文对初唐诏敕文体形式上的延续与变通,以及语言风格上的继承与变异。

(五) 初唐诏敕大多对应唐代开国之初的民生政策,接受对象多为普通民众

诏敕文在草拟时必须把百姓的理解水平考虑在内,文风质实平易,才能更好地起到政治效果。如颜师古、岑文本、李峤、崔融等人,皆为当时的大手笔。他们草拟的诏敕文在风格质朴平实中亦颇具文采。而从初唐诏敕的接受效果来看,初唐武德、贞观时期社会渐趋稳定,各种典章制度及基本政策得到贯彻实施,为唐王朝逐渐走向兴盛奠定了基础。初唐诏敕作为当时一系列德政措施的文字载体,必然也起到了其应有的政治功用。当时的普通民众能够理解这些不失文雅的诏敕,表明他们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文化水平。文化水平的高下与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密切相关,实际上,由中央官学、地方官学、私学构成的国家教育体系在初唐时期已经形成并逐步完善,教育普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民众受教育的程度普遍较高。初唐时期的教育发展水平超过了过去任何一个朝代。这一研究由初唐诏敕的语言表达方式入手,是对当时国家教育的发展水平的考察。

总之,《初唐诏敕文研究》这一论题,乃以初唐诏敕文作为考察对象,从其现有的文献情况及文本讹误的勘定、史料价值、人文特质、文学特色、在文体发展中的作用,以及对初唐国家教育发展水平的反映等方面入手,对初唐诏敕文在文献学、历史学、文学、文化教育等发展过程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做出客观判断。

二、学术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一) 唐代诏敕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外对唐代诏敕的已有研究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 以唐代诏敕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

从文学、文体学、文献学角度出发的综合性研究成果有朱红霞《唐代制诰研究》^①,该论文的研究重点为唐代的翰林制度、中书制度;对唐代诏敕的文学性分析只选择了张说、苏颋、陆贽的少数作品,对唐代诏敕文艺术特色的研究局限于声律、辞藻、对仗、用典等,而其他的文学要素在诏敕中是否具备并没有谈到,唐代诏敕思想内容及人文情感方面的研究也未涉及。文体学角度的研究成果有赵彦昌、黄娜《中国古代制书研究》(上、下)^②、李锦绣《唐“王言之制”初探——读〈唐六典〉札记之一》^③,这几篇论文的关注点主要是诏敕文体的定义及“溯源”,诏敕制度的建立与实行,该文体的思想内容、体制特征、政治功用与文化意义,在文学艺术特色方面的研究却不够深入细致。文献学角度的研究成果有韩理洲《学林本〈唐大诏令集〉点校商兑》^④、王士祥《〈唐大诏令集〉系年辨误》^⑤、唐雯《〈文苑英华〉诏制部分材料来源考略》^⑥,以及罗妮《〈全唐文〉唐代宗李豫诏敕考辨》^⑦、宋颖芳《〈全唐文〉唐玄宗李隆基诏敕考辨》^⑧、党秋妮《〈全唐文〉晚唐诏敕考辨》^⑨,以上几篇论文是对唐代诏敕文本的文献考辨及讹误勘正,并不属于文学性研究。来自海外的研究成果有日本学者池田温的《唐代诏敕目录》^⑩,属于对唐代诏敕文献目录的整理。文学角度的研究成果有张超《唐代诏敕的“典雅”之美》^⑪,是对唐代诏敕用典艺术的研究,但是对唐代诏敕其他方面的文学审美

① 朱红霞:《唐代制诰研究》,复旦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② 赵彦昌、黄娜:《中国古代制书研究》(上、下),《山西档案》,2009年第4、5期。

③ 李锦绣:《唐“王言之制”初探——读〈唐六典〉札记之一》,《季羨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④ 韩理洲:《学林本〈唐大诏令集〉点校商兑》,《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2期。

⑤ 王士祥:《〈唐大诏令集〉系年辨误》,《文学遗产》,2009年第3期。

⑥ 唐雯:《〈文苑英华〉诏制部分材料来源考略》,《北方论丛》,2005年第6期。

⑦ 罗妮:《〈全唐文〉唐代宗李豫诏敕考辨》,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⑧ 宋颖芳:《〈全唐文〉唐玄宗李隆基诏敕考辨》,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⑨ 党秋妮:《〈全唐文〉晚唐诏敕考辨》,西北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⑩ [日本]池田温:《唐代诏敕目录》,三秦出版社,1991年版。

⑪ 张超:《唐代诏敕的“典雅”之美》,《名作欣赏》,2011年第5期。